

江浙战争与民初国内政局之转化

冯筱才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江浙战争是20世纪20年代国内政局转化的一个关键点。此前两省曾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秩序。但派系冲突、上海辖权的争执等因素终于促使战祸发生。战争并未带来很大的兵力消耗,却招致严重的兵灾,以及巨额的经济损失。战争对两省绅商心理有着深远影响,同时国内政局也自此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关键词]江浙战争;影响;政治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1-0054-09

一、前言

江苏、浙江两省,在地理上既紧密相连,民俗、语言等更有许多共同点。人口、商品等频繁的流通,促进了市场的交融,亦把两省连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带。习惯上人们都以江浙并称,两省人民关系亦较他省更为和睦。岂料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江浙两省之间居然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战争。此即通常所称的江浙战争^①。是役爆发于1924年9月3日,止于10月13日,历时40日。战争打破了该地区自太平天国事败后长达60年的社会稳定,对该地区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并且牵动着全国政局的走向,成为此后中国政治格局转化的一个关键点。

但迄今为止,对江浙战争的研究却极为薄弱,一些民国史通史性著述基本上将其视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或者一部分^②。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曾撰文探讨这场战争对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及随后的国民革命的推动作用,但是战争对江浙两省及南北政局转化的影响谈得不多[1](pp.78-138)。林蔚(Arthur Waldron)在讨论直奉战争的专著中,对江浙战争有专章论及,并对该役给于地方政治、社会、经济各层面的冲击着墨不少,林氏亦注意到此次战争与五卅运动及国民革命的内在关联性。但是,江浙战争在其笔下,仍是作为直奉战争的一部分来加以探讨的,且多从军事角度入手,对于江浙战争本身的直接后果,以及与国内政治变动间的联系,作者未曾有较清晰的讨论。地方绅商的作用及与军人间的互动亦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笔者曾有专文讨论此次战事前后江浙商人之应变行动,然而论题所限,未及对战争本身作一全面审视[3]。其他尚有数篇论文

[收稿日期] 2002-11-18

[作者简介] 冯筱才(1970-),男,江西都昌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除1924年秋的这场战事外,亦有人将1925年1月发生的奉军驱逐齐燮元的战事或1925年10月孙传芳的驱奉战事称为江浙战争。本文所指系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即1924年9月3日至10月13日的战事。

② 主要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2-793页。

亦仅论及该役的爆发原因及进程[4]。

二、战前和平运动与战争肇因

民国初年,中国各地战乱频仍,兵戈纷起,尤其自袁世凯帝制复辟事发后,国内政局便一直陷于各派势力纷争之中。社会动荡将武装军人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统一的中华民国成为虚名,各地军人之割据乃为其实。一方面吴佩孚等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仍醉心于以武力整合各方,另一方面各省军人间经常因派系利益的纠葛而楚汉相对,加之一些省份内部各派势力为夺争权利大打出手,于是民国天下便演变为武人的角力场。

据统计,自1912年到1928年,共有超过1300个敌对的军事集团进行了约140次内战[5](p.30)。全国大多数省份都被卷入其中,尤其是鲁豫川皖粤湘鄂等省,战祸尤烈[6](p.105)。战端一开,交通梗阻,百业停滞;官方勒索在前,兵匪劫掠在后。民众流离失所,国家和地方的发展亦受到相当大的阻碍。然而,1924年前发生的国内战争却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江浙两省。

为什么当大半个中国都卷入了军阀战争的旋涡时,江浙一带却能大体保持稳定,社会经济仍有持续发展?这其中固然有两方战略策划、后援的联络等内在原因,但外在因素亦不可忽视:

1. 本地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江浙素为东南富庶之地,商务繁盛,贸易发达。尤其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等埠,经济地位异常重要。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亦多仰赖两省所出。江浙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在国内更居领先地位,如以对外贸易额来衡量,1923年江浙两省占全国总数52%强[7]。而依日人当时的统计,同年度中国纺织工厂的生产量,江苏一省占全国总量的61%[1](p.84)。上海作为远东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尤为国际舆论所注目。另外如文化上,江浙亦为精华荟萃之地,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故,武人们投鼠忌器,而地方绅商亦竭力维持,和平便勉强得以维持。

2. 租界及列强利益的广泛存在。尤其最重要的是上海租界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几个重要国家在两块租界的地产价值即近4亿元。而外人投资中,上海一埠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直接投资更占有二分之一[8](p.82)。另外像苏州、杭州、南京、宁波、镇江、无锡等地自1840年后亦为外人投资和传教事业的重心所在。长江水道则是外人商业势力伸向中国内地的脖颈,一旦因战事阻扼,后果不堪想像。这可称为江浙和平的第二个影响因素。而也正因此,每当江浙两省形势趋危时,外人即以种种形式对当局施以警告。

3. 绅商为主的地方精英的努力无疑亦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明清以来,随着江浙地区的绅商势力日益壮大,他们愈来愈对地方政治变迁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方官宦的政策取向。许多次战争的危机正是凭借他们的运动才得以安然度过,社会秩序没有被完全颠覆。如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宣战,但江浙却借“东南互保”无事;辛亥光复,虽然不少地方发生战事,但因江浙绅商的积极介入,并未酿成严重的社会混乱;1913年因宋教仁案,民党讨袁起事,因遭绅商反对,而转瞬即败。

20世纪20年代后,江浙两省间关系经常呈现危局,每当此时,商绅们便奔走呼吁,发起和平运动,战云常借此得以暂时消散。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奉系张作霖拟联合浙江督军卢永祥攻击江苏[9](p.251)。消息流传开来,江浙两省人心摇动,市面衰敝。张謇、盛竹书、韩国钧、张元济等江浙商绅联名上书当局,请表明对时局态度[10]。两省商会亦纷纷致电当政者,声明和战利害,希望各自保境安民[11]。1923年6月北京政变后,部分离京国会议员提议迁地制宪,卢永祥通电表示支持,于是反直派麇集沪杭两地,甚至有在杭州另行组建政府的设想。7月,直系山东督军王承斌欲联合齐燮元攻浙。8月初,保定会议上直系已确定对浙用兵计划。齐、卢亦在两省边境调兵运械,积极备战,江浙上空战云密布[12](pp.3-4)。两地商绅乃积极进行新一轮的和平运动。在江浙沪商

会及教育会等公团的努力下,经过张一麐、盛竹书等人的来往奔波,两省最终签订了一份和平公约,负责长官均签字承诺保境安民[10](pp.7-8)。此项公约可视为江浙地方商绅竭力维持和平的象征。

但是一纸和平公约并不能确保和平的长存。此后由于国内政局的演变,江浙两方关系仍时不时发生危机。两省绅商只有继续来回疏通劝说。但到淞沪警察厅长人选风潮及臧杨事件发生后,齐卢之间剑拔弩张之势已无可挽回了,战争终于爆发。

江浙战争的根本导因是上海管辖权之争夺。上海本属江苏省管辖,由江苏督军及省长直接管辖,并设镇守使和海关税务司二职。1915年11月,原上海镇守使在郑汝成被刺后,袁世凯取消原松江镇守使及上海镇守使两职合并新设淞沪护军使。首任即为原松江镇守使杨善德,卢永祥当时为副使。1917年1月,杨善德调任浙江督军,卢永祥继任淞沪护军使。1919年8月杨在任病逝,卢接任浙督,保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这样,淞沪护军使一职便因杨、卢、何以部属关系先后占据,实际上淞沪便为浙省所辖。当时浙江交通颇不便利,沪杭路为其咽喉,淞沪不啻为浙省之门户。并且上海为中国第一商埠,税源富裕,饷粮易筹,百货云屯,采办亦易。上海兵工厂又能自制军火,鸦片运销市场尚有巨额利润[13]。所以江浙两省当局自然视淞沪为肥膏,最终必有一争。

一般认为卢永祥属皖系,但在1920年后,环浙诸省均先后为直系所控制,如江苏之齐燮元、安徽之马联甲、福建之孙传芳、江西之蔡成勋。1923年曹锟贿选风潮发生后,卢永祥一再通电反对,杭州几为反直之中心。卢一面以浙省民意为依托,力倡联省自治;一面联奉联粤以作实力之倚仗,密谋讨曹倒直。直奉战争后,吴佩孚以武力统一中国为己任,故对处于半独立地位之浙江,自然视如寇仇。以上实为江浙战争之远因。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身死,何丰林委陆荣廷接任,齐燮元、韩国钧则委申振刚接任,两方面争执许久,申终于被拒。齐燮元又要求何丰林将刺徐之疑犯交与南京,何亦置之不理。齐对此二事如刺梗在喉,很想借此以武力把淞沪问题一并解决。但鉴于直系内部意见的统一还未达成,江浙商民又竭力呼吁,故暂隐忍不发。但危机已迫在眉睫了。

江浙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是臧杨问题。臧致平、杨化昭所部本为福建驻军,属皖系。1923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军务督理,次年3月,助周荫人驱逐军务帮办王永泉。王逃入泉州,以所部交杨化昭代统,杨拟与臧致平联合反攻。复败于粤军洪兆麟部,被逐出闽南。6月14日,他们率领部属由赣边转入浙江,卢永祥予以收容。齐燮元遂以违反和平公约相诘,并借此联络闽赣皖三省以武力威胁。吴佩孚亦认为浙卢之收容臧、杨,含有将来窥伺苏、赣、闽三省之意味,劝浙卢自动解散臧、杨军队,遭卢拒绝后,决定实施四省伐浙。浙卢改编臧、杨军队后,知大战在即,以督办名义咨行省署,宣布边防军条例,此条例无异于对直系之最后通牒。至此,战争已是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三、战争的经过与破坏

江浙战争之发动,齐燮元实则处主动地位。8月上旬起,齐即开始将省内各处驻军调往前线,并积极修筑工事,装运枪炮军械。8月18日,齐燮元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浙用兵计划[14](p.77)。浙江亦积极准备,将防线划为南北二路。主力用于北路以攻击齐燮元。同时以浙军张载阳部警戒孙传芳军队。双方之兵力比较,浙省主要为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四师、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及中央第六旅,与新设之浙江边防军。总共兵力在7万人左右。而江苏主要兵力为第六师、第十九师、江苏暂编第一师、第二师及七个混成旅。但由于缺员严重,其实数不过4万人。另外安徽、江西、福建等直系三省表示将和江苏协同动作,河南、湖北亦有军队加入。直系四省攻浙之兵力在10万人之上[15](pp.301-302)。

9月3日,双方在黄渡开始接触,江浙战争正式启幕。齐燮元将大本营设在昆山。分四路进

兵,第一路以第六、第二师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路达上海;又由安亭分兵攻白鹤江、重固;以第一、第四混成旅由昆太路会攻浏河。第二路以第十九师,及傅象泰部师守宜兴,分攻张渚湖等。第三路由皖军王普等部担任,自泗安趋吴兴。第四路为闽军孙传芳部,由古山、南平攻仙霞关。浙江方面,卢永祥于是日组织成浙沪联军,自任总司令,下设三路军,以何丰林、臧致平为第一军正副司令,守上海;陈乐山、杨化昭为第二军正副司令,下辖第四师,第二十四混成旅,攻长兴;张载阳、潘国纲为第三军正副司令,据守仙霞岭,以拒闽军入境。同日卢永祥发表讨曹通电。9月7日,曹锟亦下令讨伐卢永祥,褫夺二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13](pp.306-308)。

初期战斗以沪宁路为主,尤其黄渡、浏河为苏浙两军争夺之中心,但战事断断续续,阵地几度易手。和民初的多次内战相似,两方士兵打起仗来并不十分卖力,甚至有在前线互认乡亲的[16](pp.17-23)。自9月3日至9日,9月11日至20日,有两次大战,但双方均无多少进展[13](p.384)。9月10日,安徽分两路出兵,助齐燮元守宜兴一线。福建方面,孙传芳率所部六旅分三路向浙边进发。江西蔡成勋则委杨以来为赣东司令兼前敌总指挥,集结兵力于广丰、玉山、贵溪等地,配合闽军进攻浙军。9月10日,常山被闽赣军队攻下。17日,闽军越过仙霞岭向江山推进。浙军第二师潘国纲部则先后退守衢州、兰溪、桐庐。18日,卢永祥在得知第三路军前敌败讯,疑浙军有变,即通电以浙江还浙人,率部赴沪。省长张载阳亦以省长印信交警务处长夏超,以第二师师长关防交警备队总司令周凤岐,请暂为代拆代行,与卢氏同行[17](p.67)。9月25日,孙传芳所部先锋队进入杭州。旋即以大部队开至嘉兴前线。10月初,闽军连克松江、青浦、嘉定等地。而苏军则趁势在黄渡及浏河发起猛烈攻击。浙沪联军面临两面受敌之困境。10月12夜,卢永祥召集各路军事将领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松沪另图发展。13日晨,卢永祥与何丰林、臧致平等东渡日本。江浙战争基本结束。

兵凶战危,民初国内连绵不绝的混战,其最大的受害者诚为普通民众。江浙战争还在准备之中,两省民众便开始遭受种种的痛苦。拉夫、强当、勒饷、兵劫等事情接连发生,军队所经之地,交通阻滞,市面停顿。而待战火燃起,民众的损失更不可胜计。舆论一般认为江浙战争中两省民众有形无形之损失约在4亿至5亿元,非10年不可恢复[18](p.4)。但由于战事大多发生在江苏境内,加之苏军之军纪远远劣于浙军,故损失以该省为最巨。战争动员期间,苏省民众即饱受惊扰,军队肆意拉夫,官吏四处勒饷。扬州之拉夫风最烈,并有多人被逼死之惨案发生[19](p.52)。战事开始,战区平民出逃,房屋财产损失惨重。按事后统计,苏省仅战区9县的直接损失即高达6000多万元。齐燮元之属下军纪腐败,滥施横暴于战区人民。两军战事虽有停顿,但齐军骚扰民众却无有靡时[20]。齐氏之苛勒军饷更令苏人切齿,庞大的军费开支,最后全部都落在民众头上[21](p.10)。卢永祥既以爱浙相标榜,自云“视浙江为第二故乡”[22],遂有“所有作战计划,概在浙境以外,以免扰及浙人”之宣言[23]。以至苏绅沈恩孚有卢永祥“厚浙薄苏”之感慨[18](p.9)。虽如此,但兵凶战危,战争中浙江民众既饱受风鹤之惊,而受战事影响,损失自然亦不贷。如9月18日,卢永祥离浙时,以第十师及第四师当月军饷未拨,由杭州总商会商请各业筹措50余万元[24]。此虽为正常解款,但逼勒意味甚浓。浙江最严重的军费勒索是发生在孙传芳入浙后,即向杭州银钱界勒索军费现洋80万元[25]。不过与江苏战区相较,兵士抢劫在浙境内很少发生。战争初期,卢永祥曾在前线枪毙一名抢劫1700文钱的兵士,以正军纪[26]。卢永祥移驻龙华后,复发生驻湖州浙军抢劫银行8万余元一案,后所属38团团团长李廷梅被卢以军法处死[27]。

战争对江浙两省的破坏还表现在间接的层面上,如因战事而对地方金融与交通、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等等。江浙战争还在蕴酿,上海金融市场便大起波浪,公债惨跌,汇水上扬[28]。江浙其他地市的金融亦同样不稳。孙传芳入浙后,闽军携带烂板银元10余万元以军令在市场流通,商民更大受损失。其他如沪宁路、沪杭路先后被切断,北洋航路及上海附近内河航线多数停驶。致使商货梗阻,影响人民生活甚巨。两省工矿业损失亦不贷,如浙江长兴煤矿公司损失银洋

高达588万元[29](pp.845-847)。各类工厂相率停工[30](p.379)。战事爆发之时,正是农村庄稼收割季节。战区所在之地,已成熟的作物大面积被毁^①。

四、战争之影响:地方与全国

1. 战后上海自治运动的激进

江浙和平公约化为泡影后,两省绅商失望至极。战争给民众生命财产带来了巨额损失,也对他们的心理有较深的影响。苏浙人士均将弭兵之失败、战事之爆发视为极大之耻辱,甚至有人提议以9月3日为两省省耻之纪念[31]。张一麀是江浙和平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平绝望后,他的负疚感甚深[32](p.540)。在与友人的信中,张写道:“和平和平,世界万般之罪恶假汝以行。”[33](p.6)痛定思痛,不少人开始反思这次战争的成因,或者考虑避免战祸再起及减轻损害的方法。

由于上海地位之争实为引起江浙战争爆发之核心问题。淞沪护军使一职的安排、上海兵工厂等均为其主要利益矛盾所在。故军事甫结束,各界纷纷请愿,发起撤使移厂及上海永不驻兵之运动。上海总商会等沪埠六重要公团及黄以霖、盛炳纪、沈恩孚、袁希涛、黄炎培、穆湘玥等人连电北京国务院及齐燮元等人,再三提出此项要求[34]。上海商绅为达到此目的曾作了许多努力,并刺激了自治运动的发展。正如笠原十九司的研究表明,江浙战争及其随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在客观上促成了国民会议运动在上海的勃兴[1]。国民自决浪潮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开始流行,战乱的发生则加固了此种观念。上海总商会等公团在此次战事后,积极运动淞沪特别自治市之成立。1925年1月15日,孙传芳、齐燮元通电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一职,兵工厂亦择地即日迁移。段祺瑞亦下处置上海命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一职;上海兵工厂委托上海总商会暂时接收;上海嗣后永不驻军[35](p.280)。5月30日,执政府公布淞沪市自治制和淞沪市区督办署官制。明确规定淞沪市为自治区域,市督办由临时执政特任[36](pp.1-5)。这可算作民初上海自治运动最大的一项成果。但所谓“自治运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地方自治”一定程度的实现固然是政治的一种“进步”,表面上看来,民众自由度增大,政府管束能力降低,但由于上海地方上显性与隐性的势力依然存在,非军事化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而不是建立于合法任命基础上的驻军便往往更倾向于肆意敛财,且可能引起其他势力的侧目,地方秩序可能便失去依恃,冲突亦复难免。另一方面由于愿意负责任者并不多见,所以“自治”最后可能便演化成“无治”。并因此而引发日后严重的国内政治变动。

2. 战后所引起江浙两省的政治变动

战争给江浙两省带来的政治变化更为明显。浙省持续了近8年的亲皖军政当局塌台。反直基地亦归于消失。由卢永祥支持的省自治运动亦转入低谷。地方势力与北洋军人的合作共生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9月20日,夏超、周凤歧致电吴佩孚表示已扫清浙境以待后命,吴氏复电“望即欢迎孙督,共铲卢逆。倘东南大局得以早安,则国家地方勋名共戴,浙右屏藩,实惟公等是赖。”[13](pp.327-328)同日,北京政府又发出命令,裁撤闽粤边防督办及以浙江督军缺,特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22日,免张载阳职,特任夏超继任。26日,孙传芳通电浙省各界宣布就任浙江军务督理兼闽浙巡阅使之职。孙传芳的军事占领带来了舆论管制的加强,言论自由度的降低[37](pp.8-9)。此役之后,苏省亦起大变化,陷入了连年战乱之中,军事长官如走马灯般地更动。9月25日,曹錕政府令齐燮元暂兼淞沪护军使。后齐又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北京政变后,卢永祥由日本到奉天,12月11日被段祺瑞内阁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同时江苏督军一职被裁

^① 相关数据请参见《江苏兵灾调查纪实》一书中所载统计表格,江苏兵灾各县联合会1925年1月刊行。

撤,1925年1月,卢依仗奉系军队的护卫南下,于是齐燮元率部驱上海张允明部鄂军,和孙传芳联合拒奉。但齐不久即败,孙与奉订二次江浙和平公约,然其反奉之立场并未改变。待五卅事件爆发后,卢永祥辞职,杨宇霆督苏后,奉系有图浙计划,孙由是自任五省联帅,发起驱奉战争。江苏遂入孙氏之手。

3. 战事于南北政局的影响

卢永祥之所以敢置四省攻浙之态势不顾,积极应战,主要是有早已成立的“三角同盟”在作依靠。由于齐燮元属直系,而卢永祥属皖系,齐以直系各省为援,卢则倚三角同盟(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为靠,故江浙战争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

卢永祥在积极备战阶段,即请奉张援助,张作霖先派杨毓珣到杭州,表示一定派兵入关,并汇来300万元接济浙沪联军的军饷[38](p.1346)。9月1日,卢小嘉(卢永祥之子)抵奉天向张作霖请求援助,张一一承诺[13](pp.308-309)。9月4日,张又发电响应卢永祥讨曹通电,15日,正式出兵分六路入关。而吴佩孚亦于9月12日急急由洛阳赶回北京,曹锟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年、王怀庆、冯玉祥为第一、二、三军总司令。18日,下达讨奉命令。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22日,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整个北方局势遂发生重大变化。

同时卢永祥亦恳请粤省克期出师以作响应。孙中山9月4日在大本营召集第五次军事会议,议决即将大本营移至韶关,立即组织北伐军克日集结。孙中山并发表为北伐训诰国民文,表示“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39](p.44)13日,孙偕谭延闓亲往韶关督兵,准备攻赣。20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但孙当时所依仗的军事力量还只能是湘滇豫等各系军队(1924年5月黄埔军校方初建,党军还正在培养之中),而这些部队对北伐并无多大兴趣,虽然欲借“北伐”达到各自目的。不过孙中山的北伐却与随后而起的东江陈炯明所部粤军的进攻及广州“商团事变”有着密切关系[40](pp.574-579)。援浙存粤虽始终未见诸实现,但广东内部却已发生巨大变化。

4. 江浙战争与五卅事件的关系

江浙战争之后,上海自治运动虽然取得表面的进步,但是战后地方秩序的失守却成为五卅事件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五卅前夕,上海正处于江浙战争及后续战事结束之际的“三不管”状态。闻周报社的记者李嘉言曾撰文称,一个地方的管理不外乎是“官治”、“军治”或者“自治”。但是在1925年2月,上海已成了青黄不接(官、军、民)三不管的上海。就淞沪全部看来,实在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出主意负责任的人,而其结果便酿成了许多不堪的事[41](p.4)。所谓“不堪”的事,主要是指秩序失守后华界公然贩卖鸦片,驻沪军队并因此内哄开火,以致人心惶恐[42](pp.4717-4721)。一片混沌情势之中,淞沪警察厅及沪海道尹、上海县知事署、江苏交涉公署等官方机构对民众之集会、游行及学生演讲等活动多持放任态度。是故1925年2月及5月日本纱厂工潮先后爆发并得以扩散,5月30日学生进入公共租界演讲,以致最后南京路因巡捕开枪而发生流血惨案。事后,执政府及各种势力复对群众运动加以有意运用,上海的中共及国民党党团组织遂得以从容发动罢市、罢工、罢课运动,五卅运动乃勃然兴起。

因此,北京公使团认为沪案发生的关键在于上海地方无负责之高级长官,以致“毫无毅然处置之法”,要求执政府派重要官员前往弹压,或派兵前往上海[43](pp.434-438)。此后,奉系军队及重要官员陆续南下,1925年6月11日,张作霖派张学良率奉军赶赴上海[44](p.160),打破了淞沪永不驻军的命令,战后江浙一带的均势和平趋于瓦解。浙江孙传芳便以此为借口,指斥奉张“以江南为私有,拥政柄以自恣”[45](pp.693-694),在10月中旬发动驱奉战争。这也可以被视为江浙战争与五卅运动的重要后果之一。

五、结语

在我国历史上,战乱之频繁以及酷烈出乎吾人想像之外^①。俟至近世,战争更是破坏力最强的人为灾害。频繁的战乱不仅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窒碍,亦左右了国内政治格局变迁的脉络。尤其是自1916年以后,派系混战之局面愈演愈烈,而民众厌倦之情也愈来愈深。寻求摆脱之途成为有志者的奋斗目标。

然而在民国初13年中,江浙地区并没有受到较大战乱的冲击,保持了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期^② [46](p.39)。这其中除军政当局内部的原因,亦有外部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特别是本地区的重要地位与列强利益的存在。1920年后江浙两省和平运动的进行,更显现了地方绅商为维护地方秩序而作的努力及其意义,但和平运动最终的失败,亦意味着派系政治中的军人更注重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和主张。

江浙战争是派系斗争和利益冲突不断激化的产物。但是为了减少直接的兵力损耗,战事虽持续40余日,前线却颇“文雅”。兵士作战不力,但残民却凶极,以致酿成自太平天国后江浙地区最严重的一次兵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军事指挥官约束兵士的能力有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虑兵灾的成因时不可忽略的一点。江浙战争,其直接破坏主要发生在江苏,虽与战区分布有关,亦是齐燮元治军无方的灾难性后果。

由于作战双方均有同盟,江浙战争虽为一局部战争,但影响波及全国。江浙战争所发生区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战争焦点的上海不仅是一个商业金融中心,亦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所以江浙战争的影响便超出了一般人的估料之外。其与随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自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民初国内政局实相互牵涉,各地虽有所谓“割据”之名,细究起来仍应算作一个政治体。而种种史事间的关联与时序上的连续性值得我们注意。

此次战争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其对江浙绅商及一般民众心理的影响。战争的爆发既击碎了他们的和平幻想,亦促使他们作出及时的应变思考。自卫、自救等口号不仅见诸于其言论,也体现在许多的实际操作行为中。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战争的损害,亦是对清末以来的江浙地方自治运动一个新的刺激。此役之后,江浙两省社会不靖,秩序不宁,战乱亦常有发生,这不但加深了一些知识人心中长久以来的民族危机感,其政治变革欲望也许变得更加强烈,这与随后发生的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究。

[参 考 文 献]

- [1] 笠原十九司.江浙战争与上海自治运动[A].野泽丰.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C].东京:青木书店,1974.
- [2] 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 - 1925[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33):183-241.
- [4] 吴首天.浅谈“江浙战争”的爆发[J].江海学刊,1983,(5):87-88.

① 据梁启超、余天休二人之统计,自秦朝初年(公元前221年)至民国九年(1920年)止2140年期间我国内乱之次数共160次,包括革命之战争在内,所费时间为896年。平均计算每三年中即有一年为内乱。参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

② 陈训慈认为在民初的16年中,“浙江可说是大体保持和平,就是军阀作恶,也还不如鲁皖各省之烈。这对于地方政治与民力的进步,是有极大关系的”。而此阶段“浙江省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的都有稳健的进展”更与此密不可分。

- [5] Phil Billingsley. 民国时期的土匪[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6]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84.
- [7] George. E. sokolsky. How Shanghai has become the big prize[N].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1924 - 09 - 06(367).
- [8] [美]雷麦. 外人在华投资[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9] 贾逸君. 中华民国政治史:上册[M]. 上海:文化学社,1932.
- [10] 江浙人请当局对时局表白电[N]. 申报,1922 - 04 - 18(13).
- [11] 总商会请苏浙当道宣布政策[N]. 申报,1922 - 04 - 19(13).
- [12] 上海宏文图书馆. 江浙战史:第1册[M]. 上海:宏文图书馆,1924.
- [13] 江浙战纪总编[A]. 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M]. 上海. 战事写真馆,1924.
- [14] 李文直,李菊庐. 江浙战纪[M]. 上海:泰东书局,1924.
- [15] 荣孟源,章伯锋. 近代稗海:第五辑[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16] 项雄霄. 关于“齐卢之战”[A]. 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C].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
- [17] 上海宏文图书馆. 江浙战史:第3册[M]. 上海:宏文图书馆,1924.
- [18] 盛孤芳. 南北战后国民所受之损失与今后商业之趋势[J]. 钱业月报,1924,4(10):3 - 6.
- [19] 南翔劫余生. 东南烽火[M]. 上海:宏文图书馆,1924.
- [20] 江苏兵灾各县联合会. 兵灾各县损失统计表[A]. 江苏兵灾调查纪实[C]. 上海:江苏兵灾各县联合会,1925.
- [21] 孟莼荪先生函[A]. 江苏兵灾各县联合会. 江苏兵灾调查纪实[C]. 上海:江苏兵灾各县联合会,1925.
- [22] 政局骤变中之省垣近讯[N]. 越铎日报,1924 - 9 - 21(3).
- [23] 卢永祥来沪之经过[N]. 时报,1924 - 9 - 20(5).
- [24] 政局骤变中之省垣近讯[N]. 越铎日报,1924 - 9 - 21(3).
- [25] 武装势力下面的省垣商民[N]. 越铎日报,1924 - 10 - 2(3).
- [26] 吴淞枪毙敲詐民财之兵士[N]. 申报,1924 - 9 - 20(10).
- [27] 卢总司令取下之严肃[N]. 越铎日报,1924 - 9 - 28(3).
- [28] 江浙问题声中沪埠金融市况之暴变观[J]. 银行周报,1924,9(365):1 - 5.
- [29] 中国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30] 陈真,姚洛.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7.
- [31] 唐在田. 江浙大战记·序[M]. 上海:大新书局,1924.
- [32] 韩国钧. 朋僚函札选编[A]. 荣孟源,章伯锋. 近代稗海:第七辑[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33] 张仲仁先生序[A]. 江苏兵灾调查纪实[C]. 上海:江苏兵灾各县联合会,1925.
- [34] 各方之善后意见[N]. 申报,1924 - 10 - 15(3).
- [35] 刘绍唐. 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 [36] 命令[J]. 浙江公报,1925.
- [37] 项士元. 浙江新闻史[M]. 杭州:之江日报社,1930.
- [38]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3.
- [39] 上海宏文图书馆. 江浙战史:第二册[M]. 上海:宏文图书馆,1924.
- [40] 李剑农. 中国近三十年政治史[M]. 上海:太平洋书店,1933.
- [41] 慎予. 三不管的上海[N]. 国闻周报,1925 - 02 - 17(4).
- [42] 李振华. 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 [43]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M].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
- [44] 辽宁省档案馆. 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5] 孙曜. 中华民国史料[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 [46] 陈训慈. 浙江省史略[M]. 杭州:浙江青年月刊社,1935.

The Jiangsu-Zhejiang War and the Related Change of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ng Xiao-cai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e war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was a key to the change of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war didn't result in a mass death of soldiers but in a frightful calamity and enormous economic loss. It also had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two province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eace movement and the cause of the war

Despite the involvement of many other places of the country in the prolonged war after 1911,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remained at peace until the 1920's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was in crisis from time to time. The local gentry-merchants launched a peace movement so as to stop the war temporarily. Owing to the strateg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ovinces, the powers' interests and the joint efforts by local gentry-merchants, a peace agreement was signed in 1923 by Lu Yongling and Qi Xieyuan (military chiefs of the two provinces), who undertook to defend their people and territories.

The war and its loss

The war was launched by Qi Xieyuan, who prepared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ugust. It was started at Huangdu on September 10. After a seesaw battle came a stalemate. But the invasion by the Fujian troop into Zhejiang on September 17 caused Lu Yongxiang and He Fenglin to resign, thus ending the war.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people were forced to serve as coolies for the army, to make money contributions, and kidnapped. Markets were closed. Traffic was often blocked.

The influence of the war: local and national

The war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wo provinces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ir gentry-merchants. To prevent war, they made greate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autonomy movement with a view to dismissing the military chief, moving the arsenal away and stationing no troops in Shanghai, which were not done until January 1925, and also made good preparations for the May 30th Movement (1925) for protesting against imperialists slaughter of Chinese demonstrators in foreign concessions of Shanghai.

The war brought radical changes to the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In Zhejiang the pro-Anhui clique military authorities were put to an end. The new governor, Sun Chuanfang, strengthened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utonomy movement in Zhejiang.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frequently changed. The Jiangsu-Zhejiang war was a landmark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Zhang Zuolin-Sun Chuanfang-Sun Yat-sen alliance affected the situation of the whole China. In the North the Zhi Li-Fengtian war broke out along with the Jiangsu-Zhejiang war, whereas in the South Sun Yat-sen declare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1926-27) in Shaoguan.

Key words: Jiangsu-Zhejiang War; influence; political change